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

音乐研究

之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



宋博年 李 强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

音乐研究

宋博年 李强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音乐研究 / 宋博年, 李强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12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4111-1

I. ①丝… II. ①宋…②李… III. ①丝绸之路—音乐史—研究 IV. ①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228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25.5 印张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88.00 元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 屹

副 主 任 祝 谦 石永强

编 委 陈重秋 周菁葆 苗普生

沈福伟 张国刚

主 编 张新泰 李维青

主 编 张 田(执行)

策划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罗 沛

英文翻译 崔延虎

整体创意 张新泰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版说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②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图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国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新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除了保留原有的几种选题之外,又从中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注重突出学术著作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12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绸之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概念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李希霍芬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s 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1877~1912年, 5 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

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 Przweval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的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

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绸之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考察,有了重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经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绸之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绸之路学研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绸之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丝绸之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100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绸之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入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和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

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10年11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 16:10; 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華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華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道路。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与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为“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为“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我看了丛书选题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10年11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1978年5月在中国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由64件钟组成的曾侯乙编钟。经科学测定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之器。其中,有乐器8种,共计124件。

曾侯乙为人名,他是战国时期曾国一个级别不太高的小官吏。然而,他的墓葬中却出土了中国已知同类出土乐器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音律较准、保持较完好的乐器,被称为音乐史上的“世界奇迹”。

曾侯乙编钟为青铜铸造,64件分上、中、下三层八组悬挂,最大一件重203.6公斤。乐律铭文有2800字。

对编钟铭文及实物的考释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曾侯乙编钟已经相当全面系统地涉及音乐理论的许多方面。诸如绝对音高、相对音高概念;音列、音阶、音程、调式规律及旋宫转调概念,变化音名及升降关系概念;八度组概念等等。

从对编钟铭文的考释及对实物的测定中我们还得知:一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它的音域可达五个八度之广;铭文中使用了五种八度术语,十二个半音齐全。据此可证:它是中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调乐器^①。

曾侯乙钟铭中举出乐律各用语54个,其中36个用语为最新发现^②。

在对曾侯乙编钟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五声、七声以及四分之三音的发现,对东西方音乐研究,特别是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说明了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物质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的特别是音乐的通道,在人类文化的初始阶段,这条通道的建立是具有其特殊功能和特殊意义的。

关于五声音阶,中国史料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

① 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第1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第1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说明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早已在实践中使用,并有了明确的理论总结概括。

根据《管子·地员篇》的记载,说明中国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有了“三分损益法”——这种以弦的长短不同来求得音的高低关系的方法亦称之为“五度相生律”。

曾侯乙钟铭中有乐律用语54个,其中36个为最新发现。它指出12律各个音位的律名已经有了28个不同的名称,证实了《管子·地员篇》中的记载是确实的^①。从而,以实物与理论的两个方面,确切地证实了中国是最早发明五度相生律的国家。王光祈先生曾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论证过:欧洲学者认为上古时代亚西里亚采用过五声调,但后来消失了。希腊也曾用过五声调,据说是由西亚输入的。中国则早在公元前2650年左右已经存在^②。

关于五声音阶的意义,匈牙利著名音乐理论家柯达伊在其所著《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说过:“五声音阶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在曲调结构,句法,节奏上具有本质上的类同,这一切不可能是偶然的,不可能是基本思想的偶合,这必然是有前提的,它们有所接触或具有共同的源泉。”^③

孔士德研究结论是:“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是不可能同样的音阶存在的,如果甚至连基音也一样,那毫无疑问,它是出于一个单独的和其他体系没有联系的来源。”^④

柯达伊之说与本采·索特尔切所说的源头是一样的,那即是:“人类最古老的高度文明的中心是五声音阶的发源地。”^⑤

萨波奇认为:“五声音阶这种文化从中亚经过中亚细亚直到居住在里海的诸民族的心灵之中。”^⑥

从东西方学者的论述和中国文物实证中,我们可以认定:五声音阶的发源地应在中国。中西相比,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早得多。正如匈牙利音乐理论家雅诺什·卡尔帕蒂所说:“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比许多非欧洲民族要晚得多。实际上,这些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而我们自己还不到两千年。至于音乐

① 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第1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②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③ 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④ 本采·索特尔切:《五声音阶体系和文化的历史》,载《外国音乐考教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4、5期合刊。

⑤ 本采·索特尔切:《五声音阶体系和文化的历史》,载《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4、5期合刊。

⑥ 本采·索特尔切:《五声音阶体系和文化的历史》,载《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4、5期合刊。

传统,那就更短了。因为我们已知道古希腊、罗马音乐的理论,而这些音乐本身留传下来的是那样少。……足以证明,我们欧洲音乐的演化是源于伟大的古代亚洲文明。”^①

关于七声音阶在音乐史中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在《左传》中已有“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七声音阶也早已形成。

希腊毕达哥拉斯创立七声音阶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中国远在西周(公元前 11 世纪—前 8 世纪)就已经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增加了“变徵”、“变宫”两音而构成了七声音阶。中国与古希腊的七声音调完全相同。但只是中国的“宫调”最为流行,而希腊则以变宫调最为流行。根据时间的推论,中国七音调的产生比希腊至少要早 600 年^②。黄翔鹏先生对编钟铭文的考释及对实物的科学测定,同样证实了中国是最早产生七声音调的国家。

四分之三音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而且它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文物的证据,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对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他指出:“曾侯乙钟磬中的半音系列中,客角(B)偏低,而商曾(^bB)偏高,笙曾有不作‘和’字的时候,作为变化音的笙曾(F)有时也偏高,而商角([#]F)却偏低,这都是纯律大三度作用于变化音的结果。”^③这种情况,在对编钟音响的实际考查中反映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不同意四分之三音源自波斯阿拉伯的说法。

关于四分之三音的渊源问题,确实是世界音乐理论(特别是乐律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由于四分之三音存在的地域多为波斯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一些中亚、西亚乃至北非一些国家,在他们的传统古典音乐马卡姆以及近现代民族民间音乐中四分之三音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波斯、阿拉伯体系普遍认为四分之三音起源于波斯—阿拉伯。

四分之三音是一个数理概念。波斯阿拉伯乐系的七声音阶特点是具有四分之三音,从而形成了中立三阶和中立六阶。按十二平均律,一个八度音程可分为 12 等分,其中每一等分即每个半音(亦称小二度)的音分值为 100,一个全音为 200 音分。但波斯阿拉伯乐系则将每个全音分为 4 等分,每个四分音值为 50 音分。故,四分之三音音分值为 150 音分,处于大二、小二度之间。依此类推则:中立三度(中立三阶)为 350 音分,中立六度(中立六阶)音分值为 850 音分等。所以“四分之三音”体系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四分中立音律”。

从中看出:实际上十二平均律是“使律制简化的一种律”,“它用十二律应付一

① 雅诺什·卡尔帕提:《非欧洲因素对西方音乐的影响》,载《世界音乐》,1980(2)。

② 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③ 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载《音乐研究》,1981(1)。